

文史研究論文選
(上)

張國光

一九八二年九月

前 言

张国光同志在我院中文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多年，并从事文学和史学的研究，他好学深思，勤于著述。他写的论文涉及中国文学史、古代史、哲学史以及古代文论的领域，一部分已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国光同志所著的学术论文，除十九篇已结集为《水浒和金圣叹研究》出版外，还有一些文章散见于各地报刊，读者不易收集；有的尚未付刊。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提高教学质量，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流派的学术争鸣，我们特从张国光同志未结集的学术论文中选择一部分汇集成书，供参考、交流。内容疏误之处，竭诚欢迎兄弟院校和学术界的专家予以批评指教！

武汉师范学院科研究生处

1982年6月

BF35127

I206

30

2:1

目 录 (上)

前 记

读《记史·屈原列传》质疑…………… (1)

《山海经》出昆仑之黑水与赤水考…………… (17)

“叶公好龙”故事源出《庄子》考…………… (32)

我国古代珍贵的教育文献——《学记》…………… (34)

——《〈学记〉汇注辨证並译解》前言

《吕氏春秋》中关于战争的理论…………… (52)

贾谊《过秦论(上)》新评…………… (63)

千秋史笔雪沉冤…………… (66)

——《史记·淮阴侯列传》探微

史实昭然，何疑之有？…………… (80)

——读《赤壁之战辨》异议

《文心雕龙》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 (90)

玄奘对唐朝与古印度关系之促进…………… (112)

论高适《燕歌行》的本事及其主题思想…………… (126)

——与付璇琮等同志商榷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33)

——兼谈对杜甫的诬蔑



B 011661

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辨·····	(141)
——兼与瞿林东、胡如雷同志商榷	
韩愈《顺宗实录》已亡佚但仍可重辑论·····	(154)
——答瞿林东、诸同志兼论卞孝萱、章士钊先生 对顺录的误解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	(182)
韩柳之争探讨·····	(193)
论《莺莺传》中的崔莺莺·····	(219)
试解《锦瑟》之谜·····	(230)
——李商隐倾向李德裕党之一证	
* 唐代诗人与武汉·····	(241)
苏轼《日喻》疵议·····	(267)
对“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论再质疑·····	(273)
——答邓广铭先生	
爱国诗人陆放翁和他的诗·····	(287)
我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	(305)
——论陆游大量描写农村生活的诗歌	
关于陆放翁的卒年及生日·····	(325)
《西厢记》杂剧人物论·····	(328)
——兼评王实甫改编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得失	

读《史记·屈原列传》志疑

我国伟大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怀着高度的敬意与悲愤的激情，为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写了脍炙人口达两千多年的传记——《屈原列传》，并把它和汉初杰出的青年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传记合为一篇，是为《屈原贾谊列传》。本文讨论的是屈原的传记部分。

一

司马迁为什么要为屈原写传记呢？这在传文之末他已言明，其一，是由于读《离骚》、《哀郢》、《招魂》、《天问》，悲其志”；说明通过认真地阅读屈原的代表作品，他和诗人在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二，他还曾“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就是说：他亲自去考察过屈原殉难的遗迹，加深了对屈原同情，因而更为钦佩屈原的高风亮节。

其三，司马迁在《自序》中写道：“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就是说，他很推崇屈原用诗赋抒发理想，并坚持正义，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原则性。

正因为司马迁对屈原如此由衷的向往和深切的同情，因而他写屈原传用了悲愤填膺，荡气回肠的笔调，读之真使人有一唱三叹之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

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样一段，我们简直分不清司马迁是为屈原不平，还是为历史上千万个孤臣孽子辩解，抑或是在为自己抒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八个字，的确不仅是《屈原列传》的主题。而且是司马迁一生隐恨呵！因此，每当我们读《屈原列传》时，往往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报任少卿书》来。须知司马迁对汉王朝原是忠心耿耿的。他

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累，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由于他偏要为李陵辩护，“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明。”司马迁一生最大的憾事就在于此。他这种刻骨的怨愤，在历史上却找到了一位寄托者，那就是屈原。我们看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插进的那一段话：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易》

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就可以看出司马迁这里完全是在借古讽“今”，他批判甚而咒骂楚怀王没有好下场，其实是影射汉武帝的呵！

我们知道：对汉武帝十分不满，终于死在武帝之手的淮南王刘安是很景仰屈原的。他最早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

《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转引自班固《离骚》序）
把屈原的作品与孔子用作教材的《诗经》媲美，这已经够大胆了。他还称赞屈原人格高尚，特立独行，有如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
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同上）

但后汉的史家班固却很不以这种评价为然。他批评刘安“斯论似过其真”，理由是说：屈原

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
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对不容，沉
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
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

《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连屈原在作品中运用了一些神话作素材，也被指责为“不合
经义之正”。照班固看来：《离骚》根本不配与《诗经》并
提，至于“与日月争光”云云更是夸大其词了。班固这种意
见与其说是批评刘安，倒不如说是批评的司马迁；因为司马
迁在《屈原列传》中不仅全录刘安的《离骚传》，而且还大大
发展了它：他不仅认为《离骚》兼义《风》、《雅》，而且
还拟之于孔子亲自修订的《春秋》：

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明道德
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无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
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
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
疏。

司马迁认为《离骚》的伟大价值实际上超过了《春秋》，因
为《春秋》据儒家的说法，只是孔子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

张，使乱臣贼子知所戒惧的教本，而《离骚》则是屈原用心血和生命凝铸而成；它是屈原崇高品质的华表，是纪念这位诗人杰出的一生的丰碑。正是据此，司列迁才得出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也可！

的结论，显然这就比刘安的话更有说服力。

值得探讨的是：既然司马迁袭用了刘安的基本观点，而且照录了他的原文，但为什么不注明刘安的名字呢？我想其原因之一，当是由于刘安是以“大逆无道，谋反明白”罪名被迫自杀（《淮南衡山列传》）的。司马迁当时也许会考虑到，如果在传中标明：赞“《离骚》可与日月争光”的话，出自刘安之口，就会使读者感到有损于屈原的荣誉，因而姑隐其名的吧？还应看到：正是由于司马迁把刘安高度赞美屈原的话当作自己的意见写进《屈原列传》，并且使它成为这篇传记的不可分离的成分，加上它的文辞本来就很优美，因此深受读者的赞赏，甚至成为评价屈原的基调。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与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卓越形象的矗立，有赖于这篇传记的表彰，正如诸葛亮之所以成为中国民族智慧的象征，是和一些历史传说与小说戏曲对他的美化有密切关联一样。

还应看到：司马迁把不同时代的屈原与贾谊的传记合为一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文学家和政治家，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他们作品的灵魂。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不只是把屈原当文学家来写，而首先是把他当作爱国的政治活动家来写的。他还指出：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莫敢直谏。

因此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远非其他楚辞作家所及，这首先是由于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丰富的人民性之故。

二、

从以上的论析，可见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由于作者在传文中宣传了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其思想内容，以及与作者的人格、政治实践都需要统一起来的观点，他强调：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不能不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活动家，不能不关心国家的兴亡、人民的苦乐，并须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不随俗俯仰。他还全文抄录了《渔父》置于列传之末，以突出屈原与谗佞小人、昏庸的统治集团的斗争的尖锐性。这就能使读者感到：屈原的死不是一个失败者的哀鸣和绝望者的自戕其身，也不是性情固执者的“忿怼沉江”，乃是一位守正不阿之士的以生命殉自己的理想，是一个战士完满的人格的最终写照。

从这一方面说，司马迁实堪称为屈原真正的知音，是历史上给予屈原以“尽善尽美”的评价的文艺批评家。但我们赞美司马迁此文时，却不应忘记了这篇作品顾名思义乃是人物传记，自应以叙事、记主人公言行为主而不必由史家来发表过多的议论，以致喧宾夺主，使读者只注意倾听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把传主的立身行事摆在无足重轻的地位；或者知之甚少，或者毫无所知。又如有些关于屈原的材料明出后人假托，而作者却不加辨析照样引用；这就容易使读者信

伪为真。有些材料明明彼此对不上口径，而作者兼收并蓄，以致矛盾互陈，使读者无所适从。对于涉及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性问题，作者由于未之深考或者是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当然，司马迁距屈原已有两百年，他又不是湖北人，所掌握的屈原的史料确实有限，有些问题在汉初已无法落实。但他毕竟是距屈原的时代较近的最大的历史家，如果他多花些功夫进行调查访问，加上对屈原作品的细心研究，结合对楚国以及与秦、齐各国的关系钩稽排比，是不难写出一篇比较翔实可信的屈原传记的。可惜的是，司马迁似乎偏重于评赞屈原的作品与人格，而对于屈原的生平，却未详细地考稽，以致传文中出现的漏洞与自相矛盾之处甚多。不揣冒昧略加评析于次。

其一，传记文应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并非记事之正体。当然，史家应有自己的爱憎倾向，但倾向性最好是通过叙事表现出来，使读者无形中受到感染，产生共鸣。而这种“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本是司马迁所长的。可是《屈原列传》却不然，到处都有作者出面发表议论，竟成了论断与叙事并重，甚至是论断多于叙事；原因何在呢？

显然是由于司马迁觉得所掌握的资料过少，不足以写一篇传记，所以不得不多发表议论以凑篇幅。象《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也是这样：司马迁当时所能见到的关于伯夷叔齐资料总共只一段，全抄下来也不够成一篇传记，于是他就发了三层议论，针对那种“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提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反诘。可以说《伯夷列传》是愤世嫉俗之作，而传伯夷的事迹却不是作者主要的目的。《屈原列传》也可以说与此有类似之处。

其二，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写传记，首先应该交待他是何地的人，交待他的祖若父辈情况，可是司马迁只说屈原是“楚之同姓”而对他的先辈一字不提。这样，后人读《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句，就不免揣测纷纭了。还有，屈原虽仕于郢都，但他的家乡却在秭归，而这一点在传中也未涉及。

其三，关系研究屈原最重要的“数据”，是他出生于何年、卒于何年、享年若干？但传文完全回避了这些问题，这就造成了研究屈原的很大困难。《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二句至今还争论不休，即其一例。司马迁是历法家，本应对此发表有权威性的意见的，但他却不置一辞。又王夫之谓《哀郢》为哀郢都之为白起攻拔而作起。司马迁是读过《哀郢》的，白起何年占领郢都他本来也十分清楚。但他却根本不提屈原之死与郢都失落有何关系。至于屈原享年究竟若干：是五十几还是六十几，或是七十几岁死的，传中也都没有讲明，亦是疏忽。

其四，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著《离骚》。”（《自序》）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一读本传，这个结论却有了问题。因为传中明言怀王因上官大夫之谗，一“怒而疏忽屈平”，而紧接此后屈平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此“疏”字是否与“流放”为同义词，殊值得研究。因为后文明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这不是屈原在怀王时被流放之证吗？但是他于何时被放逐于何处？历时又若干年？本传俱无交代。而后文又明说“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云云。又云：“秦昭王约怀王会于武关，怀王欲行，屈平曰：……不如勿行。”试问：

一个被放逐的罪臣有资格代表楚国去与齐联盟吗？还能够直接地、一次又一次地对“国是”向怀王痛切的陈词吗？可见把“疏”字解释为“流放”实不可通。但如说“疏”绝对不能作“流放”解，那就又出现了绝大的矛盾：因为如说《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前，那它岂不是“无病呻吟”？而无病呻吟之作，又怎能感染“异代不同时”的千千万万的读者呢？

何况本传后文又写道：“屈平既嫉之，虽放流……不忘欲返……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云云，这不明明是说《离骚》乃屈原被放逐而且是在放逐生活中写的吗？

其五，由此还产生了一个屈原究竟是被流放了一次还是两次，其流放地点各在何处的问题。《屈原列传》还写道：顷襄王立后，上官大夫又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这个“迁”是当流放讲还是当迁移（即由一个流放地迁于另一个流放地）讲呢？如果当流放解，那岂不是说屈原前此根本未被流放过？如果解作顷襄王因怨恨屈原把他流放到另一地区，那后迁之地一定比原来流放地更为荒凉和僻陋，才能显示加倍对屈原的惩罚。可是屈原原来究竟流放于何处，而后来又“迁”到何处去了呢？作者竟全无交代，却在本传之末写道：“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此江是长江、汉水、还是湘江？司马迁还把《渔父》全文移植入《屈原列传》，却忘了《渔父》中的沧浪歌明显是指汉水而言。既然屈原被发行吟是在汉水之滨，那他又何紧接此后作“怀沙”之赋，并远赴湘沅“怀石自沉汨罗以死”呢？

其六，《屈原列传》最大的缺点是对上官大夫谗毁屈原的原因讲错了：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

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

照这样说，屈原和上官大夫的矛盾，好象只是为了一篇草稿的署名权，由于屈原太好名，怕失宠，不肯把草稿交给上官大夫，这才引起了对方的妒嫉，从而导致了是自己的罢黜。岂非因小而失大？那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又有什么错呢？《屈原列传》不是明说屈原疾“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吗？难道“方正”者与“邪曲”者之间，对于国家大事的见解，都无分歧，而有的只是争宠嫉能么？屈原既然身为左徒，可与王图议国事，又奉命造为宪令，可知这一宪令稿不会是一般的文书，而是较为重要的文件。作为腐朽的官僚贵族的代表人物上官大夫，对于这样的文件，怎能不竭力反对？不能设想，北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会把王安石、吕惠卿起草的新法，拿去用自己的名字上呈宋神宗批准施行，那又怎能相信上官大夫不反对而且十分赞成屈原所起草的宪令，甚至还想窃取来改署自己名字以邀怀王宠信呢？

其七，屈原有美政理想并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这是从屈赋首先是从《离骚》中看得出的。但《屈原列传》对此却很少涉及。通篇似乎把联齐抗秦作为屈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这是非常片面的。请看：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的这一乱词，可以说是屈原政治斗争的总结，他梦寐以求的是实行“美政”，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宠。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

这是多么深切的对人民的同情心呵！他谴责楚王说：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他痛斥腐朽的官僚统治集团，诛求无厌：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这才是他不满上官大夫等人的本质原因。他向怀王敲起警钟：要怀王以太康、羿、浇、寒促、夏桀、商纣为鉴戒，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榜样。他的政治纲领是：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他强调要善于选拔人才，尤其要选拔出身微贱的人才：

汤禹俨而祇敬兮，挈咎陶而能调……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这才是他与上官大夫等腐朽贵族官僚斗争的焦点。而且他已明确宣称自己和上官大夫之流的斗争，不是由于个人的利益，乃是为了国家的前途：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请把这与《屈原列传》所写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所谓屈原与上官大夫“争宠”的说法，颇有损于屈原的形象了。

其八，《屈原列传》把联齐抗秦作为屈原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加以突出，也是不合实际的。当时六国与秦虽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合纵联盟，六国也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团结过。楚怀王曾为从约长，但那不过是一个形式。六国既然同床异梦，所以企图靠外交手段来抗秦是

十分靠不住的。楚的图强首先要实施改革，修明政治，以富国强兵。再说，当时与楚接壤且堵塞秦向山东扩张的通道的是韩魏，楚要抗秦就应与韩魏友好，互为犄角。至于齐本是孤立主义者，别说靠不住，就是靠得住，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司马迁在《资治通鉴》中特别详录了《史记·张仪列传》中张仪劝怀王联秦的一段话，他说：

秦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卷三）

这也说明靠联齐抗秦只是楚的一厢情愿。再看《屈原列传》中如下的一大段话，也是多余的：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

其后又写了楚怀王如何受了张仪之欺，以及秦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的经过；还写了楚秦复和，张仪复来楚及怀王放走了他。而后又写：“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司马迁花费这么多笔墨只是为了让屈原登场讲这么一句“何不杀张仪”以表示他抗秦态度之坚决。但这话楚国朝野上下不都能讲吗，何待屈原登场讲呢？而且楚怀王也早说“欲得张仪而甘心”。即使他后来听了郑袖的话释放了张仪，难道其他臣僚就没有主张杀张仪的人么？

据《史记·楚世家》：释张仪在怀王十八年即公元前三一一年。又《秦本纪》谓张仪死于武王二年即前三〇九年。既然张仪不两年即死，就可见杀不杀张仪无所谓失策不失策。何况此时楚已累败于秦，杀了张仪虽可一泄积愤，但后

患无穷呵！请看《秦本纪》：惠王十三年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次年复伐楚，取昭陵，惠王死，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此时连齐也宾从于秦了，楚王还能“联齐抗秦”么？

再说张仪素为秦惠王宠信，他正是有恃无恐才再度来见怀王的。《史记·张仪列传》明记张仪对惠王云：“秦强楚弱……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之诛？”司马光在《通鉴》中引此语作：“张仪曰：‘秦强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卷三）是楚王无杀张仪可能，尽人皆知，屈原的话，不过是马后炮耳。再看《张仪列传》还写张仪被释放以后，对楚王讲了一大通联秦的好处，认为：楚如绝秦

秦西有巴蜀，太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

此后二十余年形势的发展，果如张仪所逆料。张仪还指出楚不能联合韩魏，如孤立地抗秦，其后果“是使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这也说明仅知道联齐而不首先联韩魏，是一种迂阔之计。屈原当时也未始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并未坚持要杀张仪，也未主张绝秦。《张仪列传》正是这样写的：

于是楚王……欲许之（指张仪）。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仪与秦亲。

可见屈原并未要求杀张仪，而且对怀王的合秦决策，谏阻也不力。

还有令人诧异的是：《屈原列传》既写了屈原质问“何不杀张仪？”又写他坚决谏阻怀王入秦赴武关之会。但在《楚世家》中这些活动都似乎与屈原无关，而是由另外两人充当联齐抗秦的主要角色：其一是为秦使于齐的陈轸：《秦本纪》写楚怀王受了张仪之欺，自以为“复得吾商于之地”时，“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据《屈原列传》此时“屈原既绌”）。又怀王二十六年（按“六”字，衍文），齐主动与楚联合，怀王犹豫不决，但由于昭睢进言，怀王遂合齐以善韩。此一重大国策之制定，亦与屈原无关。同时也正是这一位昭睢谏阻怀王勿与武关之会。他剴切陈词：“王勿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在怀王被扣留于秦，楚大臣谋对策时，又是昭睢定计，自齐迎归太子横立以为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主矣！”以杜绝秦索地要求。明朝于谦对付瓦剌，也正是师的楚人故智。但可惜的是《屈原列传》竟未载屈原在此关键时刻有什么重大建议。

由以上分析，说明屈原联齐抗秦的活动不见于《楚世家》，又和《张仪列传》所写有出入。而且本传所谓：屈原既绌不复在位之后又使于齐云云，也似不可信。因为关于屈原使齐之后达成了什么协定，是否使楚齐邦交出现了新局面等为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史记》全未交代也。再说：所谓屈原的联齐主张，在屈赋中也毫无反映，又不见于《战国策》，而司马迁却言之凿凿，这就更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试检《通鉴》各卷竟未提屈原一字，并把劝楚勿绝齐和谏怀王入